

刘创新 编著

西泠印社出版社

刘创新山樵封泥集

序

书



责任编辑：邵旭冈

责任出版：李兵

封面设计：项瑞华



ISBN 7-80517-960-3



9 787805 179605 >

定价：24.00 元



刘创新

编著

临淄新出汉封泥集

西泠印社
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临淄新出汉封泥集 / 刘创新编著. — 杭州: 西泠印社出版社, 2005.9

ISBN 7-80517-960-3

I. 临... II. 刘... III. 封泥—中国—汉代—图集
IV. K877.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01529 号

临淄新出汉封泥集

责任编辑 邵旭冈
责任出版 李 兵
封面设计 项瑞华
出版发行 西泠印社出版社
地 址 杭州解放路马坡巷 39 号 (邮编: 310009)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浙江省邮电印刷厂
开 本 787 × 1092 1/20
印 张 6
印 数 00 001 - 3 500
版 次 2005 年 9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 - 80517 - 960 - 3/K · 961
定 价 24.00 元

本书所收录的汉代封泥一百方已由马来西亚刘创新先生无偿捐献给中国印学博物馆珍藏，特致谢忱。

西泠印社

二〇〇五年八月

临淄新出封泥述略

孙慰祖

中国古代封泥的重新发现，是晚清金石学的一件大事。首先是四川地区，在道光二年（一八三二）为农民掘获一百多枚，由估人携至京师后归藏刘喜海、龚自珍、阎帖轩、吴式芬、陈介祺等人。二十年后，吴荣光在《筠清馆金石》中辑入了『刚叛右尉』、『雒右尉印』、『严道橘丞』等六枚汉代封泥，成为封泥文字最早的著录。

不久，陕西西安也陆续出土秦汉封泥，时间不晚于道光末年。一些金石家搜集封泥的兴致渐趋浓厚，除以上诸人外，刘鹗、陈宝琛等人亦参与了封泥的早期鉴藏。刘喜海以关中所出的『东郡太守章』、『同心国丞』等三十余枚附入《长安获古编》中印行，时在咸丰二年（一八五二）。

山东地区发现封泥的出土，约在同、道之际。光绪二年，陈介祺获及齐鲁所出『姑幕丞印』封泥，惊异地告知吴云：『东土竟亦有封泥』（《匱斋尺牍光绪二年致吴云书》）。初期收集齐鲁封泥的，除陈介祺、吴式芬等，尚有刘鹗，后者所得数量最多。《铁云藏陶》中附入的《铁云藏封泥》一卷，其中不少即出自齐鲁。

光绪二十三年，临淄城北刘家寨附近农田出土封泥一坑，共得一百余枚。次年，临淄县城东门外偏北一带农人制砖时又掘获一窟。刘家寨一带先后发掘十余坑，接踵收集者有郭裕

之、高鸿裁、王懿荣、丁树幀、孙文瀚、周进、陈宝琛等人。丁树幀所获封泥，后转归周进，周进从弟周明泰于一九二八年辑成《续封泥考略》六卷，所收封泥以临淄出土为主体。周氏封泥共四百五十余枚，现完整地保存于上海博物馆。郭裕之所藏一百七十余枚，后归国立北京大学。北大研究部编成《封泥存真》一卷，其中大半与罗振玉《齐鲁封泥集存》相重，盖因罗氏《集存》乃合辑刘鹗《铁云藏封泥》与郭裕之所藏封泥，增入已藏六十四枚而成，是最早按封泥出土地分域编录的专著。罗振玉所藏封泥后来又有增益，亦大多出齐鲁，现藏京都大谷大学图书馆。我在访问该校时曾目验了全部罗氏旧藏，其中尚有若干未见著录的汉官印封泥。

民国二十三年（一九三四）春，刘家寨村农田中又出土数十枚封泥，而后村民挖掘不止。王献唐为省立图书馆征集得五百余枚，其中包括孙文瀚所获的八十余枚。二年后，编辑成《临淄封泥文字》十卷。这部分封泥，今在山东省博物馆。

临淄齐故城一带是山东地区秦汉封泥的主要发现地。清末至上世纪三十年代初的出土情况，王献唐《临淄封泥文字叙》中记载稍详，其具体位置在县城东门外和北郊刘家寨村两处。两处封泥的时代有所不同。一九五八年临淄考古队曾在刘家寨作调查发掘，于T20探沟中出土封泥四十余枚，主要属于西汉初齐国及其属县、乡的封泥。这一发掘所获与三十年代刘家寨出土封泥的时代相一致。该地在齐故城内，当是西汉齐国官署所在。

以坑窖形态的大宗出土，是古代官署销毁简牍文书与封检上所抑封泥的特有现象，故所遗封泥虽集中但难免残损居多，这也决定了封泥的集中发现具有偶然性，与墓葬发掘多为零星之数完全不同。目前所知仅四川某地（具体位置不详）、陕西西安某地、咸阳相家巷村、西安丰央官遗址、山东临淄齐故城等数处。以临淄出土封泥而言，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为止，公私各家所藏约为一千余枚，零星收藏的数量不在此内，则临淄所出封泥的规模仅次于近年咸阳相家巷村遗址。这些封泥目前比较集中地收藏于上海博物馆、山东省博物馆、北京大学及日本京都大谷大学。

近五十年中，临淄未见大宗发现封泥的报道。二〇〇三年，笔者曾往临淄考察，齐故城一带正大规模拓路开发。据临淄齐国故城博物馆朱玉德馆长所说，近年附近村民偶有携封泥来馆，但索价甚昂，故难以由馆收存而流往外地。这一信息透露了临淄封泥近年又有新的发现。

以上各处集中出土的封泥，在内容和时代上各具特征。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前所知三地，四川某地以西汉中晚期郡、县官印封泥为主，西安以秦及西汉中晚期中央、各地郡县官印封泥为主，临淄所出则大多为西汉早期齐国官印，它们各成系统，对于研究其官制、地理及印文书体、简牍封栏形态等学术信息来说，具有不同的侧重点。

就临淄封泥而言，印文内容的特点表现在其职官基本上属于高祖所封刘肥之齐国，有以下三类：

一、齐王诸卿及其属官；

二、齐国封域内之县、邑官；

三、齐国辖境内之乡官。

除此之外，其他郡国的官印，发现极少，中央的朝官系统，也罕有所见。清末民国时期曾在临淄城东门外出土过少量秦代封泥，在其后未再发现。根据这样的印文内容构成情况，反映其行政活动往来范围主要限于齐国内部，因而可以确定刘家寨村出土的封泥，属于西汉齐国某一官署的遗物。

古封泥的学术价值，罗振玉曾精要地概括为：『可考见古代官制以补史乘之佚，一也；可考证古文字，有裨六书，二也；刻划精善，可考见古艺术，三也。』（《〈郑广所藏封泥〉序》）笔者曾在《中国古代封泥》一书中以临淄出土齐国封泥为主，汇订《封泥、印章中所见西汉王国官制》。临淄封泥资料包含了齐国诸卿及属官职名达四十八种，是其他地区所出封泥所远不可及的，比之以传世文献记载和其他出土实物资料，尤其有详实性、确定性和相对系统性。可以说，近世对于西汉诸侯王国官制状况的了解，是依赖临淄封泥的史料获得整体性突破的。临淄封泥资料不仅证明『官室百官，同制京师』（《汉书·诸侯王表序》），其所置三公及以下诸卿、属官亦为一应齐全，与中央王朝的体系基本对应，而且由此得以由王国之官职反证《汉书·百官公卿》所未录的部分汉朝廷官吏设置情况。临淄封泥

所反映的刘齐官制的状况，是『七国之乱』前整个西汉诸侯王国制的缩影，从置官体系方面证明汉初分封的诸侯王权势益大，与天子『尊无异筹』的状况。

概而言之，这些封泥资料的发现，在相当程度上修复了史籍遗漏的汉中央、王国官制体系，这是近代秦汉官制史研究方面的一个重要学术推进。

齐国属郡及其县、乡官印，也是临淄封泥的主要内容。由历年临淄出土的县官封泥来看，其所涉范围东至博平，北及乐陵，南达下邳。这个区间，与文献中考得的高祖六年齐国所领七郡的封域相契合（周振鹤《西汉诸侯王国封域考》）。这是临淄出土封泥在行政地理研究方面的又一史料意义。本编所录封泥中，涵齐国所领之县有临淄、东安平、莱芜、东平陵、下密、菅陵、临朐、西安、磨（当为磨城）、般阳、博昌、益、黄等县，仅般阳在齐域之外，可见与以往临淄所出封泥类多相同，其来源自可明了。

本编收入的乡印封泥，有平望、广文、广陵、安国、□利、清郭、阳夏、信安、都乡、南乡、北乡、西乡、左乡、武乡、定乡、昭乡、路乡、昌乡等，诸乡名亦见于《临淄封泥文字》及上海博物馆所藏封泥。乡官封泥在临淄以外的地点极少发现，这是由于遗址的性质所决定的。汉代的地理文献，所记载的范围基本上止于县和侯国，故对于乡与县的升降关系没有多少线索可寻。在临淄封泥中出现的乡名，大多与《汉书·地理志》所载之县和侯国相重。《史记·秦本纪》：『集小乡、邑，聚为县，置令丞』，汉代这一进程仍在继续之中。按《汉

书·地理志》所记西汉末的县数，已较秦扩增五百余个。其中一部分升格为县后即沿用了原乡名，故不少县地名凡单音节词，仍遗有「乡」字，如「台乡」、「祁乡」、「广乡」、「西乡」、「武乡」、「定乡」等等，即是此中消息。这类封泥对于探讨秦与西汉初的地理沿革，具有特殊的价值。

目前所见临淄封泥中的乡印，文字风格较县印更为古拙，遗有明显秦文字的体势，其封泥的形态，也在秦与汉初的形制范围之内，故部分乡印的铸造年代，可能在西汉之前。

以形态而论，各家所藏临淄封泥以>为主（分式依据参见拙著《封泥的发现与研究》），这在时代上具有定位的意义。根据我们的研究，>式流行的时间在秦和西汉早期，其中>式提示的时代在此期稍早。本编所辑封泥的形态多未逾此范围，其中部分属>式。结合印文书法风格，可以确定此批封泥的上限在秦汉之际，下限在西汉早期稍后。

本编辑录王国诸卿官印封泥，从品目上看，具有临淄封泥的共性，其官名涉及内官、乐官、都水、武库、铁官、司空、太仓、食官、廐官等，在山东省博物馆所藏中均可见之，但亦有可议之品。如「齐□园□」，当为奉常卿所属之掌陵园之官，临淄封泥中已有刘肥、刘襄之寝园官「齐悼惠寝」、「齐悼惠园」、「齐哀寝印」、「齐哀园印」，虽此件中两字无识，属某代齐王国不可考知，但寝园官印封泥向来罕见，仍为可珍之物。

「齐□家□」，残失下半，然按汉官印辞例，末字可确推为「印」字，冠「家」字之官

职，惟詹事属官「家令，丞」。《临淄封泥文字》著录有「齐家丞印」，可谓无独有偶，可以互证。王国家令、丞所掌为「仓谷饮食，职似司农、少府」（《通典》）。以往仅知列侯置「家丞一人」，王国无载，今据此两枚封泥，知王国詹事亦置家丞，故其史料价值不可小觑。

「都□邑□」、「辟□邑□」两泥，所阙之字当为「昌」、「阳」及各一个「丞」字。旧出临淄封泥中已见有「辟阳邑丞」，见《续封泥考略》与《齐鲁封泥集存》。「都昌邑丞」，见一九五八年齐故城发掘品及上海博物馆藏品（见《中国古代封泥》）。高祖六年封审食其为辟阳侯，邑丞为侯国行政佐官。都昌于高祖六年封予朱轡，至景帝中元年间无后国除。事均见《汉书·功臣表》。故「都昌邑丞」之时代当在景帝中元年间前。上海博物馆又藏有「都昌丞印」，亦临淄所出，是为国除复县后之物。凡此亦封泥断代标准之意义。

关于官印制度方面，此辑见有「临淄丞印」，基本完整者八枚。从印文字形看，其中不同范的抑者在四种以上，时代亦略见先后。这是颇可探讨之现象。关于汉代官印的颁、缴与改铸，由于存世官印实物有限亦无同期同文的实例可供研究，故历来误解为汉代实行职官印章前后相承袭的制度。由此，「临淄丞印」同文异范而皆属两汉早期齐国之制，可说明同一职官印章存在前后更铸的现象，而非「众官即用一印」（《南史·孔琳之传》）。这又促使我们考虑在职官印制度时代与实行官署印制度时代，官印的颁、缴制度也相应变化。汉代尚

处于职官印为主的时代，官吏所佩原非公印，官位更迁固然要缴回原印，但继任者仍须改铸颁给新印。这就形成了孔琳所说的：『每迁悉改……而终年更铸，丧功消实，金银铜炭之费不可称言。』由是孔琳之奏请实行，『众官即用一印，无烦改作』的变革。这已是东晋安帝时的事情。我们从实物上看，中国真正实行以官署印为主的制度变革，是在隋唐时完成的。此辑中类似『临淄丞印』的异范现象，还见于『东安平丞』、『勳承』等封泥。凡此又为我们研究汉代官印制度提供了特殊的信息。

此批临淄封泥达百枚之数，虽其部分残损，但官名地名多可辨识。又如前文所述，其王国、县、乡官职自成体系，为临淄封泥中具有代表性的一宗。观其泥色尚新，故可判断系近年新出之物。它同时提供了这样的信息：在消歇了近五十年后，临淄齐故城又有封泥的集中发现，值得学术界进一步关注。

综上所述，此批封泥不仅对于印史、印艺的研究，是一份颇有价值的新资料，其所涵的汉代官制与行政地理信息，亦当以史料学视角予以整理与利用。现在，封泥经由收藏者搜集、呵护而毅然赠予中国印学博物馆，一千多年前文化遗存将获长期保存并供永续利用，这对于文物本身和众多鉴赏者、研究者，都是一件幸事。

二〇〇五年五月三十日夜



临淄丞印



临淄丞印



临淄丞印



临淄丞印